

原著

論中國政治史上的高僧—— 以佛圖澄、八思巴、姚廣孝為例

張佳弘

首都文教基金會，台北，台灣

中國歷史上的高僧各具特色，而在傳統定義上的「高僧」之外，有部分出家人善用自己的才能，投入政治系統中，取得很大的政治影響力，做出重大的改變。本文的目的在於從政治的角度定義出政治史上的高僧，以及在此定義下，舉出中國歷史上三位傑出僧人：佛圖澄、八思巴、姚廣孝作為探討與比較；探討他們的動機、對政治系統的投入與產出，比較他們與其他古今中外相關人物的異同，作為一種史觀研究上的歸納與闡釋。

關鍵詞：高僧、入世、政治系統論、佛圖澄、八思巴、姚廣孝

壹、前言

歷來佛教高僧之所以「高」，大多是由於證悟修為高，或是佛學涵養程度高，或者行事影響大聲望高，或者千變萬化法力高；首類如民初的印光大師，其次如過世不久的聖嚴禪師，第三類如慈濟的證嚴上人，最後一類則如神奇色彩的達摩祖師。事實上，所謂的高僧當然不會只具有單一特質，通常修為高涵養高，自然聲望就高，神通廣大法力高通常也表示有一定的修證。不過從另類的角度來看，有一些高僧憑藉獨特的「跨界」優秀才能，在政治史上留下耀眼的足跡，從而改變了某些時代，這些高僧「高」的內涵與質量便有別於以上所提的那些「高」。

就政治史觀而言，政治地位高不高，對政治力的影響大不大，甚至本身是不是具備某一程度的政治力，才是這些僧者之所以「高」最重要的評斷依據。換句話說，他們「高的價值」主要來自於政治上的業外收益，政治地位很高，他們依然貫徹身為僧者的本業，在本業上甚至也有突出的表現。

其實，佛教與政治從一開頭就有著深不可解的淵源。創始人釋迦牟尼本身是一位王子，成道後度了頻婆沙羅王、波斯匿王等等北印度大國國王，這些及其後的國主皈依佛陀，興建精舍給教團，後來釋迦族也有許多貴族跟著出家。佛陀行化雖不分貴賤，但是藉由政治領導者的信奉推行，佛教獲得很好的開展，至少獲得了良好的保護。這種直通上層結構的作法帶來兩大

聯絡人：張佳弘，首都文教基金會，台北，台灣

Email: ahorn.gchang@msa.hinet.net

層面的方便，一是有助於宗教的發展壯大；二是對君主與貴族們的潛移默化，進而影響施政；例如在《佛說未曾有因緣經》裡提到佛陀改變了波斯匿王好殺貪宴的習性，間接提倡了護生與節約。所以後世僧人多有藉助政權支持或庇護來傳播教義也就順理成章，至於進一步從政治上來改變一些事也就不足為奇。此種因循果現的標竿學習效果其他宗教一樣有所體現，例如耶穌的殉教啟示開發隨後的聖徒們捨身勇進，穆罕默德曾領導的「聖戰」至今依然深深教化著不少穆斯林。

貳、探索政治高僧的途徑與準則

本文嘗試藉由歷史的探索與政治系統的分析，發現並了解佛教高僧政治投入的過程與造成的效果影響。以中國史書上的例證挖掘，歸納整理這些許是「不務正業」卻在俗世間「立下功業」僧者們的圖像，展露他們不同於一般的人世表現。

一、史觀探討的途徑

研究歷史人物難免的荒謬性來自於史料的不可驗證，真偽直誣只能依據不同史冊相互的辯試以得出文字載錄上的相對真實，究竟是紙頭上的以真辨偽、以真證真（註1）¹抑或是奠基於主觀認定的資料偽科學，似乎都無恆準的檢測論定。尤其研究中國政治史上的高僧必須鳥瞰他們的角色混雜性，存在著有效溶解同時分析他們的修行者人格與政治人格的期望，於是更有挑戰。如服膺經驗主義(Empiricism)或實證主義(Positivism)式的掃描，那麼宗教的神聖性(Sanctity)與修行者人格的談論空間便非常有限；如陷於哲學宇宙論、本體論或超本體論(Me-ontology)的申辯調整，那麼個人與宗教的密契經驗(Mystical Experience)便顯得蕩然；更別說純粹理性主義下人的感性興趣如斯乾癟，不惟諸如《景德傳燈錄》、《指月錄》等古籍在此類觀點中不值一哂，整個禪宗也不值置一喙，如此便與錢穆視高僧為「人統」立德者的看法（註2）²背道而馳。尤有甚者，如以絕對懷疑論或不可知論(Agnosticism)者觀之，那麼整部《大藏經》未必有一字為真，中國二十四史中未必有一句是實，連在世年代未有定論的釋迦牟尼以至所有宗教皆不可說。同樣的，若以機械論(Mechanism)或唯物史觀來論述也必將枯燥而工具化。何況中國史學自成一格，體例上與價值取向皆很有個性，「褒貶尤為一大傳統」³，例如毫無表現毫無作為的伯夷、管寧之流可以入傳而大受讚揚^{4、5}，這種歷史道德專利世上少見。

綜合以上，在人與史、僧與政、歷史詮釋(Historical-Hermeneutic)的命題探討中，為免落於方法論的窘誤偏仄，本文以為應採用「有了人物，下面自然會不斷有歷史」⁶的人文主義(Humanism)史觀精神，本「亦哲學亦宗教」⁷知識論的基礎來理解佛學與高僧，而不以西方教廷或神學的視角來窺探中國歷史。文獻上以中國正史(官書、別史)為主，側重於政治史觀上政事表露與權力溝通的本紀、列傳，「考慮認同感、結構、領導層面的影響」⁸；《大藏經》史料為輔。表詮敘述處理人物史料的呈現與遮掩，並借用「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原則擷摘各方法論點進行必要性的史料批判。針對宗教性的密契或超自然經驗則運用現象學

(Phenomenology) 不帶成見的「括弧」(Eingeklammerte) 表達「存而不論」或「懸置」^{9、10}，以拒絕「只知其一的無知」。要強調的是，人物史料於本文的作用是舉「例證」，而非為「立傳」。

至於政治場域的角色行為著重於叔孫豹所提三不朽中的「立功」範疇，亦即錢穆所指涉的「事統」¹¹。由是摒棄政治哲學的辯釋，援引行為主義 (Behaviourism) 學者 David Easton 所提「政治系統論」(Political System Theory) ——「社會價值權威性分配」的互動體系¹²，作為檢視高僧的政治行為表現依據。檢驗此類高僧他們如何投入以及投入什麼 (Inputs) 到政治系統中，動機是什麼，有無受到支持；他們在政治系統中的行為是什麼，如何與其他角色特別是君主互動，產出什麼環境影響 (Outputs)，亦即如何改變當時的國家機器與市民社會，產生了什麼回饋。進而得以推斷、歸納出此類僧者的特質，並與同一時空或不同時空的相關人物互相比較，比較出政治史觀上的價值取向。

二、政治高僧的篩選準則

純粹意義上的政治高僧不將佛教當作交換政治權力的把戲，不會是一個「亂搞的政治和尚」，而是一個「很會搞政治的大和尚」。他們符合政治疆域界定與身份認同之外，在政治系統中必須要有很高的地位與影響力，即本身至少具備權力正當性 (Legitimacy)、政治權威性 (Authority) 以及利益表達 (Interest Articulation) 職能¹³。一個反面的例子是禪宗六祖慧能的師兄神秀和尚，他雖被唐武則天尊為國師，「肩輿上殿，親加跪禮」¹⁴，但究其實不過是作為籠絡佛教徒的工具，毫無政治實力可言，此類象徵圖騰不算。

此外，所謂政治影響力必須分辨主被動關係。譬如中國佛教譯經史上名列一、二偉大的玄奘與鳩摩羅什在政治場域中也有能見度 (註 3)¹⁵⁻¹⁷，但是不論從正史或是道宣的《續高僧傳·卷四》、慧立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一》以及慧皎的《高僧傳·卷二》中都可以發現，二僧並未對中國政治環境有重大影響，相反的，他們獲得並接受執政當局偌大的贊助錢、地、人從事翻譯。玄奘回國後即忙著譯經凡二十年，「全世界譯書最多的恐怕沒有人在他之上」¹⁸，直到死前二十七天才停筆，甚至顧不上贊助者唐太宗亂吃丹藥害病而薨。他在《舊唐書》的記載更只有百餘字，皆與政事無關。而鳩摩羅什在幾個軍閥手上流轉，甚至被強令納婦。換句話說，他們「被政治影響」遠遠大於「影響政治」，學術地位或社會地位遠遠高於政治地位。類此二人絕對是高僧，卻絕對不是政治高僧。

再者論政治影響力強弱。例如慧能的徒弟荷澤神會於安史之亂時「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¹⁹輸功而獲得榮寵地位，但此後他藉社會地位忙於宣揚「頓教」，在政治上已無任何表現。類此一次性的從旁助攻，政治系統性投入單位太弱者，不計。

依據上述政治力的有無、主客體與強弱準則來耙梳中國歷史，試舉三位高僧來進一步探討，分別是南北朝的佛圖澄、元朝的八思巴以及明朝的姚廣孝 (道衍)。他們三位極具代表性，以下依時代先後分「歷史生平與政治連帶」以及「政治系統中的功能表現」介紹論述。

參、佛法與政治的共舞，文明與野蠻的對話：佛圖澄

一、歷史生平與政治連帶

南北朝時來自西域的佛圖澄（232-348年）的入選，主要是因為他在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朝中獲得敬重，發揮極大影響力。七十九歲高齡的佛圖澄入洛陽時，西晉已亡，中國北方陷入大混亂，少數民族此起彼落割據征戰，打得天昏地暗，其中後趙國主嗜殺成性的石勒以及石虎（石勒姪），都對佛圖澄崇敬有加，為他大興佛寺，提倡佛教，許多出家人因而得以活命，一般人民藉由出家而避過殺禍的更是多不勝數。

佛圖澄涉入政治場域很有技巧，在魔王面前得到重用的原因據說是他會預言和法術。據《晉書》記載，佛圖澄見到石勒兇殘好殺，決意以佛法濟世救人。他很有策略地先收服石勒的部屬，幫忙預測戰役吉凶，引起石勒注意，然後在大殿現場「取鉢盛水，燒香祝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石勒大呼驚奇，當下奉他為國師。他還很擅長治病，治到起死回生，他曾作法讓石虎一個死了兩天的兒子活過來，「澄取楊枝沾水，灑而祝之……因此遂蘇」，從此貴族小孩都養在佛寺中。²⁰

佛圖澄「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預言也每發必中，小至皇上發脾氣，大到每次戰役勝負、有人密謀篡位等等，於是石勒計必聽國師，言必稱「大和尚」。但魔王之心難揣，石勒雖然愛他，有一次無明火起也想傷害他，還好他預先躲了起來。²¹不過佛圖澄再怎麼料事如神也無法改變歷史的命運，後來石虎廢掉石勒死後留下的幼帝，篡位自立。這個人類史上壞到出格的暴君更加殘暴，種種暴行既多又難以置信。試舉二個例子：石虎一旦破城必定屠城，「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²²石虎一家相互虐殺，石虎虐殺意圖篡位的兒子，燒完屍體還「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²³

這樣的魔頭對佛圖澄卻更加尊重，他曾下詔：「和上（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大官們要攙扶他，還要起立敬禮。石虎常常問：「佛法如何？」佛圖澄便答：「佛法不殺。」²⁴這問題石虎經常一問再問，因為他總是一忘再忘。所幸佛圖澄抓住暴君崇佛的機會，開啟了一扇逃生的善巧之門。除上述史載外，《十六國春秋》也錄有：「是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註4）²⁵

佛圖澄活到一百一十七歲，過世時「士庶悲哀號赴傾國」，因為他「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他雖沒有留下著作但是竭力傳播佛法，徒子徒孫將近一萬人，包括後來鼎鼎大名的道安和尚。²⁶

二、政治系統中的功能表現

梁啟超指出最先最近之史料最可信。²⁷《晉書》與其他佛教史錄如《釋氏通鑑》、《佛祖統紀》等對佛圖澄的記載內容大致出自《高僧傳》，可是由於《高僧傳》記載太多他的法力神

蹟，他的佛學傳播與利用種種善巧方便慈悲濟世的襟懷往往被忽略。事實上那個時代留下各種神奇傳說的神僧很多，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外國人，他們不僅比較會念經（因為懂梵文），還都有特異功能。關於特異功能，多次以科學驗證的現任台大校長李嗣涔很有研究，²⁸真耶偽乎？在此存進「括弧」而不論。

然而佛圖澄的政治價值不是那個時代的同儕可以比擬，他能夠兼顧理想與政治現實，從本覺智慧流出影響力，運用的技巧與機遇可以說接近佛陀度化波斯匿王的種種「權智」。反觀其他高僧譬如達摩，他社會化嚴重不足，晉見歷史上最愛佛法的國主梁武帝，說不上幾句話就被請出去。²⁹再如擅長驅鬼與男女雙身法的大譯師曇無讖，後來被他的信徒北涼國主沮渠蒙遜以間諜罪名殺了，活不到五十歲。^{30、31}換句話說，即使其他高僧法力與佛學修養也一時無雙，但是並無法藉政治力做出重大改變與影響，只有佛圖澄能令人間魔王長久拜服，進而活人無數，並且「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³²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佛圖澄與石勒、石虎存在非常微妙的互相利用關係。佛圖澄固然利用統治權力來傳教與救人，魔王叔姪又何嘗不是利用他的神通力與號召力，來當作護身符趨吉避凶以及博得崇佛的名聲。佛圖澄縱然法力無邊，佛心無我，仍無法摧滅魔王本性，最終無助朝代替亡。姚崇說：「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³³也許是個好註腳。

檢視佛圖澄的動機其實很單純，以佛法與神通力投入政治系統，互動中獲取君主信任，影響施政，交換到他所希求的環境回饋：地位超卓、生靈活命與佛法廣佈。可說是以小乘的法術為鉤牽，行大乘的拔苦救濟。

最重要的是，佛圖澄立下一個「前無古僧」的典範，他敢於面對惡人惡事，敢於在惡劣濁世中開出屬於自己的清流，如同一矢響箭劃過南北朝的大地，在中國歷史上久久迴音繚繞。佛圖澄的留學地罽賓（今阿富汗東北、喀什米爾一帶）傳說是大乘佛教的發源地之一，他以一個標準的外國人，讓自己好好活著在魔王耳畔諄諄佛語，為濟世活人貢獻整個晚年，確然行的是菩薩大道——這即是他難能可貴的「高」。

肆、政教合璧，亦僧亦王：八思巴

一、歷史生平與政治連帶

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師八思巴（1235-1280年），中國信史上最早建立大規模政教合一體制的成就，是他入選的最主要理由。能和他媲美的只有漢末割據四川北部的張魯，以及清末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一個是道教一支五斗米道，一個是中西合體很難定義的「類基督教」。中國版圖內領政地方的佛僧，八思巴是首例。倒不是邊疆地區沒出現過政教合一體制，只是在他之前從來沒有出現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下。

八思巴是個神童，生有宿慧，據《元史》記載，他七歲就能誦經數十萬言，略通文義，所以大家叫他「八思巴」（聖人的意思，本名因而不傳）。³⁴十五歲到忽必烈的潛邸，為他夫婦

灌頂受戒，當時的忽必烈已經三十五歲，這種相差二十歲懸殊的老少配師徒組合史上並不多見。同年他繼任薩迦派（花教）的新教主，為該派五祖。³⁵

忽必烈登基之後，立即尊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王，統天下教門。」後來還封他為藏區政教之主，正式設立西藏最高統治機構「總制院」（後改名「宣政院」），由八思巴統領。³⁶從此開創了薩迦王朝時期，使西藏結束長達將近四百年(877~1264年)的分裂割據狀態，正式進入教派輪替統治的時期，並促進漢、蒙、藏不同民族間各方面的交流。

在這之前，八思巴除了為忽必烈灌頂受戒之外，正史記錄只有一件大功勞，就是佛道大辯論贏了中國道士們，使元朝獨尊佛教得到正當性。但是因此就能獲得這麼大的信任與權力分享，雖然不是不可能，但是對忽必烈這樣的人傑梟雄來說，似乎不是那麼簡單。或許可以推測，在忽必烈打敗競爭者取得大汗位，以及後來統一中國的征戰當中，國師八思巴可能提供某些協助，法力加持也好，信仰上的心理建設也好，都不無可能。更可能的是，忽必烈必須借重八思巴來穩定藏區，藉由八思巴的效忠並且經常將他留在身邊，間接使得大西藏歸順在轄下，一方面以尊寵地位籠絡羈縻，一方面以中央武力遙制，便可以省卻後顧之憂，不失為上策。

其中的來龍去脈已經不可得知，史上記錄八思巴確實辦過許多場佛事如祈雨和著名的白傘蓋法。他並且發明蒙古文字，後世稱「八思巴文」。忽必烈確實也對他很好，給權給錢給地給創意尊號，他下詔：「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八思巴早慧可惜也早死，只活了四十六歲，忽必烈賜他「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等等共三十八字諡號，還將十一張他的遺像通傳各省，作為塑像的範本。³⁷「法王」二字，中國史書中只偶然出現在奉承武則天的奏章上，卻從此成了元朝西藏政教合一藩王領主的尊稱。恩澤更及於八思巴的後人。他的弟弟接下位子繼續當帝師；他的弟子也入朝當大官；而他推薦的功嘉葛刺思法力高強，也被封為國師。他們一僧一帝，堪稱是難得一見的君臣恩遇典範。

二、政治系統中的功能表現

八思巴短短一生做了不少事，也抽空翻譯佛經並寫下經典傳世。據薩迦派流傳，八思巴曾進行西藏第一次人口普查，並且拒絕忽必烈獨尊薩迦派而禁止西藏其他教派的提議，這在政治與宗教上均是相當不易的「利益表達」職能，同時也展現他無比的政治權威。

可想而知，當時中國很多人對八思巴很反感，一則由於他協助異族統治，是大漢族的眼中釘；二則他舌戰打敗群道，大破《老子化胡經》這部偽經，³⁸道士們丟臉又丟觀產，憤恨不已；三則顯密有別，中國和尚雖然高興元朝獨尊釋家，但也不是多麼高興，畢竟正宗在喇嘛，已經有了位階上下的分別，更少有政治參與的空間。所以很多人稱八思巴為妖僧，這是把他當異己攻訐的妖魔化，實際上八思巴的貢獻是全面性的，不僅在政治與宗教領域有非常出色的表現，在文化、經濟、民族交流上的特殊功業也不容抹滅。即便交流存在「負功能」，也是一種交流。

他雖然短命，可是很好命，遇到一位有慧眼又有政治智慧的明君。八思巴與忽必烈可以說「互為」伯樂與千里馬，宗教上的千里馬是八思巴，政治上的千里馬則是忽必烈。正因為如此，八思巴既為法王又統天下教門，在中國歷史上的政教地位「無僧可及」。

史料中不容易發掘八思巴投入政治系統的動機，他應是認為這是一個教主的份內之事，降服外道，盡力協助皈依弟子的君王；接著由於系統角色相互激盪，自我運作出政教合一的法王。而他也不過是在有生之年扮演好法王的角色，卻因此產出西藏的新政局，衝開一扇新的歷史扉頁，激盪出異質文化的新火花——亦即他的「高」在於慧命。所以不論從何種角度來看，將 Max Weber 所說的 Charisma（天賦/神授/教祖般的非凡魅力與領導力）用在他身上都非常合適。

伍、比張良超諸葛，妖僧抑或聖僧：姚廣孝

一、歷史生平與政治連帶

第三位政治高僧姚廣孝（道衍，1335-1418年）特別的複雜，不僅僅是他外在的經歷、建立的事業很特殊，他的內心世界也彷彿迷宮中的迷宮，一不小心就使人徹底迷路。這種複雜的交織使得他在歷史上的定位更加複雜，時而熠熠耀人，時而晦澀迷離。

姚廣孝本名天禧，出家的法名叫道衍（正史以姚廣孝列傳，本文從此名）。十四歲落髮為僧，卻師事道士學陰陽術。簡介之，他即是明成祖朱棣篡位取得天下的最關鍵人物。

中國幾千年來殺人篡位不算什麼，但是在統一的太平盛世搶走自己姪子的皇位，然後子孫綿延二百多年，只有這個案例。劉邦、趙匡胤、朱元璋、皇太極他們的王朝都是從亂世中打來；曹丕、司馬炎是接上一代的棒子，給朝代換個招牌而已；春秋戰國、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弑親奪位雖不少見，但都是在大分裂狀態下，國祚也都不長，很快被下架；李世民殺他兄弟，是奪嫡順便逼父讓位，不是武裝革命。由這些比較可以看出朱棣的奇遇，以及背後的影武者姚廣孝的政治史地位。

《明史》記載，青年姚廣孝在嵩山郊遊的時候，大相士袁珙見到他說，「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姚廣孝聽了卻很高興。馬皇后死後，朱元璋決定要為每個兒子配一個和尚，誦經薦福同時輔佐。³⁹在配對大會上，當時的怪和尚道衍一眼見到心儀已久、當時風采迷人的燕王朱棣（「王貌奇偉，美髭髯」）⁴⁰，兩人一拍即合，從此改變了整個大明朝的命運。

「靖難」起兵之前，朱棣說：「民心向彼，奈何？」自知師出無名，姚廣孝回答：「臣知天道，何論民心。」其實姚廣孝早就在幫朱棣秘密練兵，挖了地下室鑄造兵器，還在地面上養了很多鵝鴨來掩蓋聲音。⁴¹當時中國本土已經大致平靜了將近三十年，朱棣雖然善戰並戍守北方，但是軍力絕對無法比拼中央，如果不是經營許久怎麼可能在建文元年就起兵。可知朱棣早就預謀，絕不是被形勢以及姚廣孝逼著造反，反而建文帝朱允炆才是被種種跡象以及來自燕王府的密報逼著急急下手削藩。

朱棣起兵當時，剛好下起大雨，怪風把屋瓦吹落，朱棣驚悚，姚廣孝隨即開示：「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瓦黃同「皇」音）。」⁴²這些史料如果不稍微分析一下，會不慎以為朱棣造反都是姚廣孝攬掇的，而這恐怕正是明朝官方設下的陰謀。這些戲劇化的設計大致是朱棣與他的後代們基於掩飾事實所編造或誇大出來，相關的事證早已經抹消殆盡，使得《明史》編纂者也只好在官方殘簡當中，將朱棣造反的匿藏動機圍繞在姚廣孝身上。活像是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後的假造輿論，散佈各種鄉野傳奇表示李世民才是真龍天子，甚至導致唐傳奇與武俠小說鼻祖《虬髯客》的出現。朱棣與其後代的扭捏，只學到李世民後來的花招，卻沒有比照李世民把玄武門之變的始末留在史書中的大方。

若說姚廣孝只是一顆政變起因的煙幕彈，也完全不對。持平而論，靖難之變是姚廣孝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得到姚廣孝也是朱棣一生中最大的幸運。姚廣孝一開始就主持秘密練兵，後來參贊軍機於各大小戰役中。有一次中央軍趁朱棣領軍在外，圍困北平城，也是靠留守的姚廣孝化險為夷，「守禦甚固，擊却攻者。」尤其重要的軍事進退，幾乎都是聽從姚廣孝的謀劃，包括濟南遇阻，他寫信說：「師老矣，請班師。」朱棣於是退兵。後來也是他要朱棣捨棄外圍城池，「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最終取得勝利。⁴³由此看來，姚廣孝除了是「半仙」也絕對是軍事天才，加上朱棣本人就像是曹操一般的梟雄人物，領兵打仗、政治謀略很有一套，姚廣孝剛好可以比擬官渡之戰曹操帳下的首席謀士郭嘉（字奉孝）。

巧的是，朱允炆也是和袁紹差不多的傻瓜。他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急躁削藩；開戰前把朱棣的三個人質兒子全放回家；指揮官出門打仗前，他居然叮嚀：「毋使朕背負殺叔之名。」⁴⁴朱棣吃定這一點，每次敗仗就親自騎馬斷後，中央軍不敢追也不敢放箭。然後他在第二任指揮官丟掉五十萬大軍之後，不但不殺，繼續重用，直到那人乾脆投降朱棣。⁴⁵這種政治智商需要好好探究的人當皇帝，內政國防的風險係數實在太高，或許這也是姚廣孝造反的原因之一。

成敗論英雄是正常的，但在成敗未顯未定時，能夠知成論敗是了不起的。姚廣孝政治投資眼光之準，投資策略之踏實，大概直追古代的呂不韋和現代的希拉蕊·柯林頓，可以在礦石中看出玉璽，再逐步琢磨出明成祖、秦始皇和美國總統。大概也只有「神機妙算、神功蓋世」足以形容這幾個人。據傳姚廣孝還有一項神功是其他人無法想像。有好幾次朱棣打敗仗時，戰場上會突然颳起怪風，朱棣立刻趁機反敗為勝，（註5）⁴⁶擅於附會的人指出這是因為曉陰陽術的姚廣孝作法，彷彿他是《三國演義》裡借東風、「多智而近妖（魯迅語）」的諸葛亮。這且不論，不過他確實像諸葛亮那樣甘於輔佐，不像前述兩位想當太上皇或是自己登基。

但是老實說，諸葛亮的功業遠遠比不上姚廣孝。或許諸葛亮是倒楣，遇到太多高手，出不了四川；姚廣孝幸運，遇到的都是庸才。然而就事論事，姚廣孝幫助朱棣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成就霸業，開創一個大時代的命運，這份成就諸葛亮的確是沒得比。姚廣孝的才能大概只比張良差一些，不過以朱棣靖難起兵時只有區區數萬兵力，做的是大失民心篡位的事，短短三年可以打敗天下號稱百萬的勤王之師，所差也很有限了。

朱棣跟他的關係很好，姚廣孝是朱棣的第一謀臣，「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

力為多，論功以為第一。」可知他在朱棣心中的地位。朱棣即帝位後，讓他當大官，教太子讀書，恢復本來姓氏，賜名廣孝，朱棣本人通常只尊稱他少師。朱棣曾要他還俗，賜豪宅與美女，姚廣孝都不要。他戴官帽穿官服去上朝，下朝就換回僧衣，終其一生住在廟裡。⁴⁷多少有「諸事已辦，不受後有」的況味。不知他是否因此避開史上常有的帝王雄猜之禍，即使是，那也算他精明。

姚廣孝在政事與學術著作上的表現也很搶眼。他在朱棣將破南京城時交代千萬別殺方孝孺，「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⁴⁸心懷天下讀書種子，令人感動。可惜方孝孺把霸王朱棣惹火，被凌遲還被滅了十族。

姚廣孝重視人才不只這一端，他的弟子福吉祥就是後來的大太監鄭和，帶著史上最大艦隊創下中國最輝煌航海史績的鄭和。

在學術上，學歷很不正統的姚廣孝主持重修《明太祖實錄》、修纂《永樂大典》。他還寫下：論道術的《天象玄機》、《三悟真詮》；罵盡程朱理學罵得不錯的《道餘錄》；論佛的《諸上善人詠》與歷代淨土往生要文的《淨土簡要論》；以及自己的文學創作《逃虛子詩文集》等等。儼然儒釋道大會通。

姚廣孝這類從龍之士與霸主的君臣關係，能夠有始有終的實在不多，看看朱元璋的大將謀士們的淒慘下場便知一二，殺得精光，連累孫子朱允炆一個可用的名臣宿將都沒有。何況朱棣本人殘殺異己時也非常恐怖。姚廣孝高壽八十四歲，因他的過世，朱棣「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封國公，親自為他監製神道碑記錄功勳，也讓他的牌位入太廟從祀，⁴⁹等於把他當朱家祖宗看待。

難免的，姚廣孝造反成功後遇到一些尷尬事。他也真的很奇怪，難道以為自己衣錦還鄉會受到熱烈歡迎，難道他真的不知道中國人很不欣賞造反的亂臣賊子。史載他的親姊姊拒不見他，不小心相遇後，把他臭罵一頓。他的家鄉老友也不見他，遠遠丟下兩句「和尚誤矣，和尚誤矣！」跑了，姚廣孝惘然。⁵⁰說他「誤」是站在正朔的立場指謫他叛亂造反，然而這事見仁見智，他在世人眼中無疑是一個力倡並力助篡位的妖僧，但是站在朱棣一方的立場，他做的反而是順天應人事業，是個大大的聖僧。

二、政治系統中的功能表現

從靖難之變前後來看，姚廣孝很有「造反，就是為了要造反」的味道。孔子說：「政者，正也。」（《論語·顏淵第十七》）可是到底何謂正道？所謂正道在每個人心中應該都有不同的演繹，眼光的不同、價值判斷的取捨、身份認同的差異、意識型態的分歧往往會使正道的走向導致不一樣的歸宿。畢竟人的一生短暫，難能看通透「世出世間法」。「造反」本身是不是符合所謂正道的某些基本原則，並不是那麼簡單可以判定，換句話說，或許姚廣孝心中早有一個「我就是知道朱棣才是真龍天子」的正道信念。

姚廣孝各方面都顯得很複雜，但事實上他投入政治系統的動機卻很單純，就是想幫朱棣

造反，一展抱負。他投入的不只是一個軍師策士的智慧，實際上還很有導師的角色功能，他們的互動關係早已經超越亦師亦友，應該稱他們兩知音為恩師密友。政治力互動之密切與細膩，可以從姚廣孝臨死前要求朱棣釋放一個關了十幾年的前朝宮廷和尚來窺見。這個和尚據說知曉建文帝南京城陷宮廷大火時變裝出逃的內情。(註6)這個要求或許是姚廣孝死前的一念之仁，不過深究一下，這一念之仁有很大的玄機。放這個和尚的真正意義，其實是希望朱棣不要再花費心力和資源去尋找建文帝的下落，甚至派鄭和找到南洋去，同時牽連很多無辜的人；即使朱允炆還活著，這麼長的時間下來，他早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他希望的是朱棣能放下，放下這個鬼魅般的懸念，放下世人的目光，放下自己心中的罪惡感與不安。所以，這一念之仁澤被的是全天下，特別是一國之君的朱棣，這才是他「其言也善」的真正目的。朱棣似乎也懂了，「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⁵¹

由上種種能夠清楚，以姚廣孝的心思、手段獲得權力不是沒道理。他也很擅於運用權力與權威，除了軍事決策，特別還有政策提案權，例如朱棣遷都北平正是來自他的意見，從此開創了迄今六百多年的北京城國都史。中國以前的外患麻煩大多來自北方，當時退出關外的蒙古人並沒有完全死心，而且歷史上定都南方多是偏安的小朝廷，所以這是很實際且正確的政策。

可畏的是，由於他們的結合，國家機器的最上層因此被換掉，這麼不可思議的政權翻盤手腕乃是姚廣孝真正的「高」。

而他的複雜正在於此，因為他的所「高」之處與傳統意義上的「僧」距離很遠。他終身為僧、不違出家基本律行又是不爭事實，受他扶持的朱棣與繼任皇帝在位時，中國也算是個小盛世，所以姚廣孝的「高」與「僧」免不了地並存得這般複雜而曖昧，「高僧」這頂帽子他戴得歪歪的，但是也只好讓他這麼歪戴著。

陸、結論

作為例證的三位高僧各自有各自的精彩，都不愧為所在時代為所當為、有所建樹的一方人物，都是很會搞政治也把政治搞得很好的大和尚。以政治系統論與佛教入世觀來看，可以發現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這般的僧者，未必有高超的學術地位卻擁有政治力並取得亮眼的政治成就。不論動機是為了救人（佛圖澄）、法王的責任（八思巴）、造反（姚廣孝），三位高僧都是藉由將自己的智慧與才能投入政治系統，透過與帝王的良好互動，取得政治地位與影響力，並善用自己的權力進而改變了政局、改變了社會、改變了一個時代。

他們與一般認知的高僧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有人政治修羅場的勇氣與過人的政治智巧。他們選擇站在政治的黑布幕前，讓自己的才智光芒與色彩更加對比綻放出來，猶如夜空中的慧星。反過來說，假使沒有這塊政治黑布幕來襯，他們也許不過是出家滄海中的一粟，繁星中的一閃。

他們入世的功能表現嚴格而言偏向儒家的「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也接近莊子（《天下》）所謂的「內聖外王」；他們有沒有「入解脫門」無從查知，另類的「出菩提路」倒

是非常明顯；不僅沒有濫權紀錄，且都有利益眾生的政策主張。儒釋道在某種層次上應是相近的。

侍人魔的佛圖澄真正的「高」不在神通，而在慈悲濟世菩薩心腸，救民無數。抓政權的八思巴的「高」不在當法王，而是他能開創大規模的政教合一體制，而且盡心做到最好。姚廣孝的「高」在於他是一位造反的天才、藝術家、和尚。

佛教能夠在中國大為流行，有一個原因是對於避世的思想很能融會，尤其後世禪宗走向山林水邊更是顯例。內求型的佛教當然不會發展出像是十字軍東征或是大大小小的「聖戰」，卻反而使得鄉愿者有了遁世的宗教藉口，也供給佛教的出世觀更多養分。德操與教育貢獻當然值得稱頌，然而歷來得道高僧們少有幾人離開叢林經院，投入政治系統又能夠擁有影響力創出成績的更是鳳毛麟角。因此，上舉政治史觀上的三位高僧儘管很不傳統，儘管運用的手法不盡相同，但他們的入世成就都顯得如此華麗，如此穿山破水。

註解

1. 梁啟超提出辨證史書偽事的七種態度，包括「正誤與辨偽，皆貴舉反證」、「偽事之反證，以能得『直接史料』為最上」等等，並強調考證之功在「求真」。
2. 錢穆認為學問有三大系統：第一「人統」、第二「事統」、第三「學統」。是從春秋叔孫豹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轉換而來。他指出，禪宗大興，把如何作一出家人轉成為如何成佛，亦可謂是第一系統者。
3. 《舊唐書》載玄奘事有：「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晉書》載羅什事有：「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等。《魏書》載羅什事有：「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等。
4. 許多人為求生躲進廟裡。《晉書》中載有石虎（字季龍）下令削減，但因佛圖澄故，不廢佛事。「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5. 例如：「東北風忽起，塵埃蔽天，燕兵大呼，乘風縱擊……」、「會旋風起，折景隆旂，王乘風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與戰，大風拔木，傑、安敗走，追至真定城下……」等。
6. 《明史》中載：「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徧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正補編·新史學合刊）》。台北：里仁。2000年，頁141-147
2.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台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年，頁254
3.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華世。1981年，頁282
4. 同2。頁138-139
5.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東大。1988年，頁88-93
6. 同5。頁94
7.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台北：黎明。1988年，頁376
8. 許倬雲。《從歷史看時代轉移》。台北：洪建全基金會。2001年：頁19
9. Pivcevic, Edo【英】著，廖仁義譯。《胡賽爾與現象學》。台北：桂冠。1986年：頁99-112
10. 吳汝鈞。《胡賽爾現象學解析》。台北：台灣商務。2001年，頁：44-52
11. 同2。頁245
12. 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5
13. Ranney, Austin【美】著，林劍秋譯。《政治學：政治科學導論》。台北：桂冠，頁11-16
14. 後晉·劉昫。《舊唐書（百衲本）》。卷一百九十一·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15. 同上。
16. 唐·房喬。《晉書（百衲本）》。卷九十五·列傳第六十五
17. 北魏·魏收。《魏書（百衲本）》。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
18. 同1。頁309
19.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冊。V1.35, No. 2061, CBETA 電子佛典普及版。取自中華佛典協會（CBETA）。電子佛典集成（April 2011）。<http://www.cbeta.org>
20. 同16
21. 同16
22. 同16。卷一百零六·載記第六
23. 同16。卷一百零七·載記第七
24. 梁·慧皎。《高僧傳》。卷九·神異上。《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冊。V1.35, No. 2059, CBETA 電子佛典普及版。取自中華佛典協會（CBETA）。電子佛典集成（April 2011）。<http://www.cbeta.org>
25. 唐·房喬。《十六國春秋》。石虎傳。
26. 同24
27. 同1。頁125
28. 李嗣涇。《遨遊有形與無形界》。《佛學與科學》2003；7：84-94
29. 歷代法寶記。卷一。《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一冊。V1.13, No. 2075, CBETA 電子佛典普及版。取自中華佛典協會（CBETA）。電子佛典集成（April 2011）。<http://www.cbeta.org>
30. 唐·李延壽。《北史》。卷九十三·列傳第八十一
31. 同24。卷二·譯經中
32. 同24。
33. 同14。卷九十六·列傳第四十六
34. 明·宋濂、王禕。《元史（百衲本）》。卷二百零二·列傳第八十九

35.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八。《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十九冊。V1.51, No. 2035, CBETA 電子佛典普及版。取自中華佛典協會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http://www.cbeta.org
36. 同 34
37. 同 34
38. 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卷。第五。《卍新纂續藏經》第七十七冊。V1.9, No. 1521, CBETA 電子佛普及版。取自中華佛典協會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http://www.cbeta.org
39. 清·張廷玉。《明史》(百衲本)。卷一四五·列傳第三十三
40. 同上。卷五·本紀第五
41. 同 39
42. 同 39
43. 同 39
44. 清·夏燮。《明通鑑》。卷十二·本紀第十二
45. 同 39。卷四·本紀第四
46. 同 39。卷五·本紀第五
47. 同 39
48. 同 39。卷一四一·列傳第二十九
49. 同 39
50. 同 39
51. 同 39

On Eminent Monks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Examples from Fotucheng, Phags-pa, Yao Guangxiao

Jia-Horng Chang
Capital Foundation, Taipei, Taiwan

Each eminent Buddhist monk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had his own special featur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 eminent monk ", there were some Buddhist monks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talent and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system where they obtained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even made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describe two things. One is to define eminent mon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e other is to point out three outstanding Buddhist monk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namely Fotucheng, Phags-pa, and Yao Guangxiao, under this definition. Their inputs and output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ir motives are discussed, and the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similar people. Finally, induction and detection are found out as a historical viewpoint research.

Keywords: eminent monk, mundane, political system, Fotucheng, Phags-pa, Yao Guangxiao